

觀景察變：台灣日治時期日記的 旅行敘事

林淑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教授

中文摘要

台灣日治時期日記的內容，不僅具記錄代表性的歷史事件、留存時代記憶等史料價值；同時蘊含書寫豐盈的台灣地景，以及個人旅行感受等文學面向。如此私密的珍貴文化資產，作者如何書寫旅行過程？這些書寫又具有記錄哪些時代轉換痕跡的功能？1927年《臺灣日日新報》曾舉辦「臺灣八景票選」活動，委員會最後公布鵝鑾鼻、阿里山、日月潭、太魯閣、淡水港、壽山、基隆旭丘山、八仙山，名列八景；新高山及台灣神社則列為別格。本文擇選時代相近的日記，且作者常記錄至台灣各地旅遊的經驗，以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田健治郎《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作為研究素材。探討日記中所載台灣八景及二別格，分析旅行過程的敘事，以及地景所蘊含的時代轉換痕跡；藉以發掘文本與文化的關聯，並詮釋作者的空間心境或地方感的學術意義。

關鍵詞：八景、二別格、張麗俊、田健治郎、林獻堂

Viewing Landscapes to Observe Change: Travel Narratives in Diarie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Lin, Shu-hu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Diaries writte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not only possess historical values of recording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and keeping the memories of times, but also hold literary values with the illustration of Taiwan's landscapes as well as the authors' personal feelings about their traveling. So how did the writers illustrate their trips in such private works? How do these writings preserve the trace of the changes of times in Taiwan? In 1927, the Taiwan Nichinichi Shimpō reported the Eight Views of Taiwan as: Cape Eluanbi, Mountain Ali, Sun Moon Lake, Taroko, Tamsui, Ape Hill, Keelung Rising Sun Hill, and Eight Immortals Mountain. In addition, New High Hill and Taiwan Shrine were claimed to be the Two Special Views of Taiwan. This paper uses three diaries that are written in similar times and contain experiences of traveling around Taiwan as research materials. The three diaries are "The Diary of Chang Li-Jun," "The Diary of Taiwan Governor-general Den Kenjiro," and "The Diary of Mr. Guan Yuan(Lin Xian-tang)."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ages of

the Eight Views and Two Special Views of Taiwan portrayed in the diaries, analyzes the narratives about traveling and the trace of changes implied in the illustrated landscapes; it aims to explo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exts and culture, interpreting the academic meaning of the authors' spatial mind or sense of place.

Key words: Eight Views of Taiwan, Two Special Views, Chang Li-Jun, Baron Den Kenjiro, Lin Xian-tang

觀景察變：台灣日治時期日記的 旅行敘事

一、前言

台灣目前所見一些日記的內容，不僅具記錄代表性的歷史事件、留存時代記憶等史料價值；同時蘊含書寫豐盈的台灣地景，以及個人旅行感受等文學面向。日記為記當時之事，與事後追記，或可能回憶失真與迴護自己的回憶錄、自傳、口述歷史迥異。有些日記提供平民觀點的歷史素材，與官方檔案的敘事視角有所差異¹。日治時期的日記不僅蘊含台灣現代社會變遷的痕跡，且反映知識分子內心的世界。因日記字裡行間表達個人意識，其中的旅行敘事亦常流露作者的空間心境。

地景的意義依附於命名、故事及儀式等，以及成員對於歷史與象徵意義的共享。至於漢字文化圈中「八景」的擇定與書寫，學界對於相關的研究已積累許多成果，不論就八景的沿革、各地八景書寫以及八景的象徵意義等議題多有所探討。東亞各地亦曾出現八景的稱名，甚至八景的相關書寫²。台灣清治時期八景的擇定是對統治斯土的明確宣示，反映的是統治者宣示治權的動機，同時也是誇耀治功的舉動。清治時期來台官宦所撰八景詩及日治時期總督府官員的

¹ 許雪姬，〈台灣日記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台灣史研究》22卷1期（2015年3月），頁158。

² 衣若芬，〈「江山如畫」與「畫裏江山」：宋元題「瀟湘」山水畫詩之比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3期（2003年9月），頁33-37；蕭瓊瑞，〈認同與懷鄉：臺灣方志圖中的文人意識（以大八景為例）〉，《臺灣美術》第65期（2006年7月），頁5-9。馬來西亞八景的書寫研究，如邱克威，〈林連玉〈吉隆八景詩〉釋義：兼論林連玉的詩藝風格〉，《台灣東南亞學刊》11卷2期（2016年10月），頁141-160。

觀景，顯現遊宦文人或治台官員的敘事位置。另一層面，Tim Cresswell 於《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指出，地方是人們將意義依附於空間而產生的³。台灣日治時期在地文人如何書寫風景，反映自我觀看的心境，及作品流露的地方感。

日記為台灣研究的重要史料之一，近年學界陸續出版台灣近現代人物的日記，有助於開拓台灣的文史研究。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已出版多部具史料價值的台灣現代人物日記，並將珍貴史料數位化，舉辦日記研究的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台灣文學學報》第 13 期曾以日記為專輯主題，積累相關的研究成果；另如傳統文人的日記方面，台中縣文化局曾出版《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匯集討論張麗俊日記相關的論文。又如廖振富曾討論傅錫祺的生平、日記的由來與內容，並比較四套櫟社詩人日記的特色，就「文學結社」與「現代性體驗」分析其研究價值⁴。目前以日記為主的研究面向，涵蓋廣泛的議題，並具延展多重歷史脈絡的學術意義。

本文擇選時代相近的日記，且作者的位置不同，並曾記錄至台灣多個地景旅遊的經驗為例。1927 年《臺灣日日新報》舉辦「台灣八景票選」，最終由委員會確定何者入選八景二別格，為企圖影響民眾對於地景認知的活動。從閱讀目前所見日治時期的日記中，發現田健治郎、張麗俊、林獻堂不僅於日治時期詳細記錄至台灣各地旅遊的過程，且其日記隱含對這些地景與時代變遷的關聯。以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田健治郎《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作為研究素材，主要因田健治郎為日本文官總督、張麗俊為地方型士紳、林獻堂則具全台性的影響力。由於身分與社會地位不一，得見其觀看視角的差異性；又因三人皆具漢文寫作的素養，其日記文字富含文學底蘊。雖田健治郎日記所載旅行敘事早在八景票選之前，然正可呈現台灣總督對於這些特殊地景的感受，以及官方治理的觀點。故本文分析此三部日記保存哪

³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2006 年），頁 34-65。

⁴ 陳志聲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台中縣文化局，2005 年）；廖振富，〈《傅錫祺日記》的發現及其研究價值：以文學與文化議題為討論範圍〉，《臺灣史研究》18 卷 4 期（2011 年 12 月），頁 202-204。

些旅行過程的敘事？日記中的地景又蘊含何種時代變遷的軌跡？為呈現此三部日記遊台的主要路線及轉乘的方式，以日治時期的古地圖為底圖，繪製其動態路線。先分析旅行過程的敘事，再探討地景所蘊含的時代轉換痕跡兩層面，藉以發掘文本與文化的關聯，詮釋日記所描述空間心境的學術意義。

二、旅行過程的敘事

1927年《臺灣日日新報》曾舉辦「台灣八景票選」活動，從6月10日開始投票，統計到7月27日，投票活動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當年6月5日的《臺灣日日新報》曾刊載相關資訊，包括投票的方法、發送的方法、八景的決定、顧問委員以及介紹宣傳。此票選活動採通信推薦投票，一人不只一票，但一張票寫上兩個景色者不予計算⁵。為帶動投票風潮，不僅報社推出投票者有機會獲得相關贈獎，也報導台灣各地相繼踴躍催票的情形。此活動促使風景成為公共議題，活動前曾引起許多人於報紙投書高談闊論交通便利性、觀光及地區開發等實質層面。

八景票選期間，每天於《臺灣日日新報》公布前日投票結果，票選後統計投票數高達三億六千萬票，突顯民眾對此投票活動的積極參與。但八景的選定仍由委員會最終決定，包括總督府的相關中心人員、教員、軍人、民間出身者擔任審查委員。選定的結果為：鵝鑾鼻、阿里山、日月潭、太魯閣、淡水港、壽山、基隆旭丘山、八仙山名列八景，新高山及台灣神社則列為別格⁶。先以圖1呈現1927年票選後委員會決定的八景及別格的位置：

⁵ 臺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6月5日，第2版。

⁶ 由《臺灣日日新報》舉辦台灣八景票選活動，「台灣八景」選定的最後結果，刊載在《臺灣日日新報》，昭和2年（1927）8月1日，第4版；吳兆宗，《昭和2年臺灣八景募集活動及其影響》（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頁101-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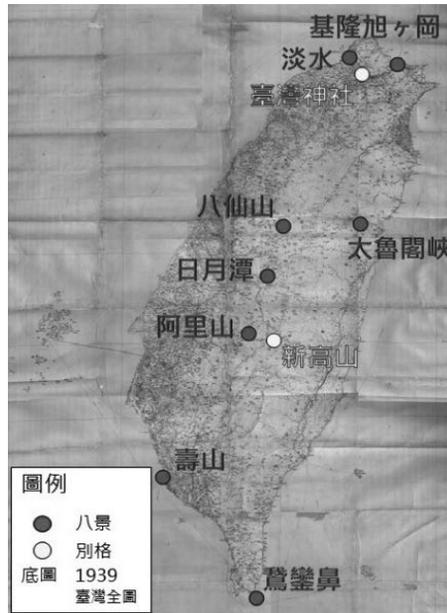


圖 1：1927 年《臺灣日日新報》票選台灣八景分布圖

圖 1 為應用現存時代相近的 1939 年台灣全圖為底圖，繪製 1927 年委員會最終決定的八景與二別格於台灣各地分布的情形。從權力運作的角度來看，風景及其各種再現形式，所訴諸的是自然的美感意識，因此加諸在上的各種社會力的操作，欲從這個文化形式所再現的自然，達到隱藏權力運作痕跡的目的。在山水之中選擇精華的景色，建立地理的特殊關係，文人墨客得以體驗自然，八景因而成為一種特殊的空間實踐⁷。觀諸此次委員會不只參考票選結果，又依照在全島分布、景觀的特色、規模大小、交通便利、天然古蹟考量，決定最終選定的結果。從這次票選的募集、宣傳，或活動後觀光政策的調整，皆能看出殖民者參與其中，顯然扮演活動主導的地位。

這些特定時空所產生的代表性地景，在以漢文撰寫的日記中是如何再現？先以《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為例，1919 年 10 月 29 日出生於兵庫縣的田健治郎（1855-1930）接任台灣總督，12 月初即任命民政長官下村宏，策劃七項重

⁷ 林開世，〈風景的形成和文明的建立：十九世紀宜蘭的個案〉，《臺灣人類學刊》1 卷 2 期（2003 年 12 月），頁 1-15。

要政策，包括「諸學校內地人、本島人共學之調查」，以及「醫、農、文科大學創設之計劃」。翌年 2 月，田健治郎在帝國議會預算總會上，說明開放內台共學、台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必要性與益處，以及設立高等教育需要千萬元的金額等，可說是高等教育施設調查後的正式發表⁸。任職幾近四年（1919-1923）期間，標榜內地延長主義統治政策，強調「一視同仁」，任內並推動許多重大改革，包括施行台灣地方自治、發布台灣教育令、日本人和台灣人共學等⁹。此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上任後，曾於大正 10 年（1921）邀請全台詩人五十餘人在總督官邸開茶會¹⁰。他於任職期間展開各項改革措施，且前往台灣各地視察，更於日記詳細記載相關細節，呈現他的觀察視角。

八景中列於首位的鵝鑾鼻位於台灣最南端，田健治郎曾於 1920 年記載到此地景的經驗：「將近鵝鑾鼻角，海豚成群飛躍於海表，不知其幾千萬，頗為壯觀。」（《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1920 年 4 月 26 日，頁 280）鵝鑾鼻以及墾丁國家公園鄰近海域，因具有多樣性的海洋棲息環境和複雜的海流交會，是台灣鯨及海豚組成最豐富的地方¹¹。田健治郎不僅描繪成群的海豚如衝浪般的跳躍，捕捉海面上鮮明的文學意象；亦觀察海岸周圍的自然地景，描寫丘山起伏與熱帶林的特殊性。如日記中描寫：「透遲〔迤〕登山徑，眺望闊大，鵝鑾燈臺在指顧之間。近山頂，入密林之間，榕樹縱橫垂根，真呈熱帶地之觀。而清泉混混湧出，種畜場水道取源于茲也。」（《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1920 年 4 月 27 日，頁 281）從各種眺望的角度記錄鵝鑾鼻周圍景觀，又走入山頂榕樹林而感受熱帶氛圍，以及清泉湧生成為種畜場水道源頭的功能性。以台灣總督巡視的視角，記錄帝國最南端的南國意象。他更以詩作表達所思所感，如：「黑潮急駛北風號，巨舶簸揚如桔槔；千百海豚衝浪躍，鵝鑾鼻角客懷豪。」（《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1920 年 4 月 26 日，頁 280）為理解此詩流

⁸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2 年），頁 39。

⁹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等主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 年），1919 年 12 月 5 日，頁 96。（以下引文直接在文末註明）

¹⁰ 吳鈺瑾，《島民、新民與國民：日治臺籍教師劉克明（1884~1967）的同化之道》（台北：秀威資訊，2015 年），頁 215。

¹¹ 王愈超，〈墾丁國家公園鄰近海域鯨豚類生物調查研究〉，《保育研究報告》第 107 號（2000 年 12 月），頁 19。

露作者的心境，從身為台灣總督的經歷窺知概況。從 1920 年末林獻堂、蔡培火為首的文化運動開始醞釀，翌年初正式展開向日本國會的請願運動，但隨即遭到田健治郎總督的強烈反對。他觀察留學生和台灣仕紳內部的民意，又見議會請願運動，故更強化府評議會的設置¹²。田健治郎於文官總督任內早已流露返回日本的企圖心，當他接獲入閣的邀請後隨即離台。此詩中以「客懷豪」的修辭，隱含過客心態，以及總督身分位置的豪氣，透露觀看台灣的視角。

《水竹居主人日記》為目前所見台灣日治時期傳統文人留存的日記之一，作者張麗俊（1868-1941），曾受傳統漢學 15 年教育。1899 年他受命擔任下南坑第一保保正，共長達 19 年，1912 年到 1918 年同時擔任葫蘆墩區十九保聯合會議長。當他卸職後，常於日記中載錄與友朋遊歷台灣，如 1928 年 12 月 5 日參加高雄全島產業組合大會而南遊。不僅記錄當時回程路線等交通方式，亦具保存當時觀光紀念戳印等觀光客的活動資料的價值。至於林獻堂曾於 1930 年至鵝鑾鼻，他記錄：

此燈臺是前清光緒年間（明治八年）所建築，領臺後多少修改。燈光千灼，以玻璃反映其光，可以增至二十七倍。守燈臺之吏頗親切，以望遠鏡觀七星石，海潮搏石，浪花如雪。此石離燈台有九湮之遙，蓋有此石，若非有此燈台，舟經於此則非常危險。¹³

林獻堂著重於燈塔修築的背景沿革，更強調燈塔所具防止船難的實用功能。日治時期的鵝鑾鼻燈塔由最初的軍事、外交功能，逐漸成為台灣旅遊的觀光景點。鵝鑾鼻具自然海灣與生態的多樣性，更是台灣南端的地景象徵。

位於中部著名八景之一阿里山，1930 年 11 月底張麗俊與鄭添喜、廖盛祥、陳振通、黃珍及新竹州、台中州及嘉義郡一部產業組合役員團體百餘人，再次南遊。為較詳細呈現張麗俊至阿里山的路線，故編繪成圖 2：

¹² 林惠琇，《「六三問題」與日治時期台灣知識菁英自治主張之研究》（台北：稻鄉，2009 年），頁 70。

¹³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三）》（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年），1930 年 11 月 5 日，頁 3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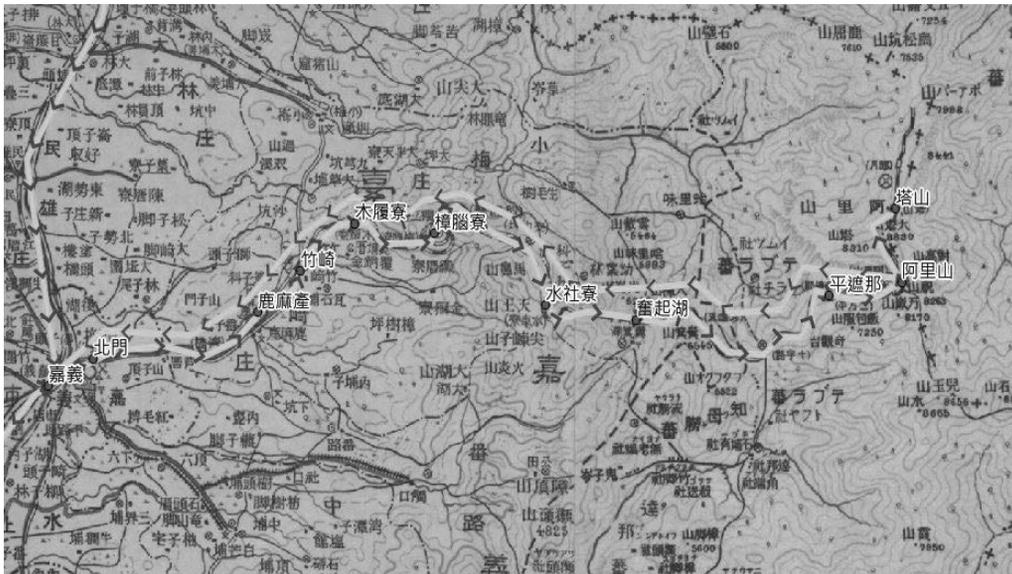


圖 2：張麗俊至阿里山路線圖

(資料來源：以中央研究院建置「百年歷史地圖」的「1924 年日治臺灣全圖 (第三版)」為底圖，再加以編製而成。)

圖 2 呈現張麗俊走訪阿里山路線細節，於嘉義北門集合，轉搭阿里山小火車，經鹿麻庄（鹿麻產）、竹頭崎（竹崎）、木屨蔡、樟腦蔡、水社蔡、奮起湖、平遮那、塔山，而後回阿里山。參謁神社後，乘車經奮起湖、竹崎、抵嘉義驛，乘北上列車回豐原。沿途記錄地名、海拔高度，並撰寫〈登阿里山〉一詩：「絕頂登臨曙色斑，蒼茫雲海別塵寰，乾坤浩氣鍾神木，岱嶽精靈萃祝山。鼎峙新高觀五鼓，車纏獨立望三環，今無李杜長篇學，恨不全圖寫景還。」他從山頂環顧風景，描述登頂後觀賞斑斕的曙色、蒼茫雲海與群山氣勢，以及山上的神木等自然景觀。同時詳記行車過程，並抒發希望自己能更具創作長篇詩的涵養，以刻劃阿里山風景全貌的感受，呈現詩人的視角。至於林獻堂於日記中亦曾提及樟腦蔡，1931 年從嘉義驛藉由鐵道前往阿里山，沿途地名、林相變化、景色以及伐木作業情形：

獨立山之上則為暖帶林，下為熱帶林，平遮那以上即為溫帶林。車至二萬坪，海拔六、五五四，望山下之雲，宛如在海邊觀海水，故名之曰雲海。是處因雨山崩十餘丈，若再經豪雨，鐵道定必崩壞。¹⁴

林獻堂以雲海比喻成海邊之景，視雲如波的景象；另一方面，則關切維護阿里山鐵道不易的實況。另一中部地景八仙山，張麗俊曾與組合役員、職員一同前往營林所俱樂部，並在此欣賞八仙山美景。他於日記中回憶八仙山的命名緣由，以及台灣票選八景活動後，因八仙山入選而受託於此地石碑題字銘記¹⁵。八仙山林場與阿里山、太平山並稱為台灣三大林場，前兩者入選八景，日記作者多描繪其登臨這些林場的當下感受。

旅行是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移動，交通工具的選擇牽涉到路線、性別、年齡、階級劃分、特權、地位及心理預期等問題。且因交通工具不同的選擇，所看到的景觀以及激發的記憶也有所改變¹⁶。中部著名八景之一日月潭，舊地名為水沙連及珠潭，一些清治時期來台官員，已記錄日月潭地理形勢、進入路線等資料。又觀察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初日月潭的原住民聚落，並描述關於原住民的經濟生活、禁忌、習俗等面向¹⁷。至於第一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如何記載視察的經驗？他曾於 1921 年 5 月 16 至 26 日巡訪中部之水利工程設施，先搭乘帝國製糖會社輕鐵列車從台中出發，途經霧峰；後改搭南投明治製糖會社的列車，再乘台車前往集集、日月潭，並前往視察水力發電廠相關工程如圖 3：

¹⁴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1931年3月20日，頁93。

¹⁵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中：台中縣文化局，2004年），1936年8月14日，頁245-246。

¹⁶ 廖炳惠，〈旅行、記憶與認同〉，《臺灣與世界文學的匯流》（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頁180-189。

¹⁷ 陳計堯，〈「邵族」與「鄒族」：日治時期對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知識建構〉，《政大民族學報》第24期（2005年11月），頁210。



圖 3：田健治郎巡視日月潭路線圖

(資料來源：以中央研究院建置「百年歷史地圖」的「1924 年日治臺灣全圖（第三版）」為底圖，再加以編製而成。)

圖 3 顯示田健治郎於觀集集電力會社新設鐵道隧道、視察索道停留場及溢水吐出閘之位置，又至日月潭分岐點，觀電力工事之電車鐵道線。隨行者包括幕僚、新聞記者，如高田、山形、喜多、白川、納富、吉武及佐野等約十人。因安排參觀林本源製糖會社，故社長林熊徵與擔任翻譯的秘書許丙，亦自台北啟程隨行。另有擔任說明工程的人士，如大越隆三技師，新元鐵道部長、川崎三局長、吉岡台南知事、林獻堂曾送行。入日月潭的聚落，百名原住民列隊歡迎，以歌舞迎接總督。又留下此詩：「時入雨期霪雨頻，橋梁墜落道途堙；修治幸賴官民力，一路平安客意新。」又是強調「客」的身分，並流露以巡行視角考察殖民建設。他又描寫日月潭的地景：「潭中心有一小島，稱硃仔島，堺之俗分之左右，右潭稱月潭，左稱日潭，比月潭，其面積倍之。先入月潭，上陸於

一地點，觀頭社堰堤地點。」¹⁸另記錄所見物質文化的層面：「返舟而登硃仔島頂，入一小亭榭而午食。此漁民永住於筏上，專從事於漁業，又有飼豚於筏內者。」（《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頁 187-188）不僅提及日月潭得名由來、形狀、面積等背景，且敘及原住民、漢人的生產活動。至於張麗俊 1934 年則記錄與張世翰，組合役員林慶財、熊阿木等人，觀賞原住民婦女表演的情形：「少頃出十七婦女，執杵者十五人，只二人打管和之，杵由石畔撞之，只兮大小疾徐，鏗然有金石之聲，撞罷又合歌一曲，後各地方組合役職員合番婦執杵寫真記念。」¹⁹除了記錄及合照的活動之外，他又以詩描寫日月潭「水光山色兩悠悠，一抹煙霞天際浮」的自然意象及涵碧樓的建築。詩中提到：「南瞻島嶼供神社，東望番人渡木舟，莫怪高騷來住宿，無邊風景愛清遊。」（《水竹居主人日記（九）》，1934 年 11 月 13 日，頁 509-510）形容神社等日治時期的文化地景，並以遊記描繪日月潭之旅的經驗，又以詩呈現山水意象，流露個人的感受。另如：「經營電力振瀛東，日月潭盈落水雄，建築安全開地利，機關巧妙奪天功。依誰一見三分白，冀得千秋萬點紅，特喜流光全島遍，街莊州市盡交通。」（《水竹居主人日記（九）》，1934 年 11 月 15 日，頁 511）從日月潭發電所的現代化建設工程，表達發揮電力功能的讚嘆，以及設立後對社會發展影響甚鉅的情形。「互文」為藉由不同形式，彼此互相補充、闡發、補足，具參照互見、互注、語意相互補足的效果。張麗俊等人以詩文相映或參照的方式，傳達至八景心境的表現手法。

位於東部的太魯閣，因交通不便的因素，日記中較少見到相關記載。僅見林獻堂原本預定 1935 年與林資彬、林柏壽前往太魯閣一遊，卻因為下雨且臨海道路的通車時間限制，因此未到仙臺橋即返回²⁰。太魯閣的立霧溪大理石峽谷、自然湖泊與高位河階等景觀，以及兩板塊運動所造成的高山皆具原始山林

¹⁸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邱純惠主編，鍾淑敏執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6 年），1921 年 5 月 22 日，頁 187。（以下引文直接在文末註明）

¹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九）》（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中：台中縣文化局，2004 年），1934 年 11 月 12 日，頁 507-508。（以下引文直接在文末註明）

²⁰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 年），1935 年 11 月 5 日，頁 392。

風貌²¹，緊臨太平洋的狹道崎嶇險峻，太魯閣地形與地勢為世界級的自然奇景，惟須先克服當時旅途的難度。

至於北部的八景以淡水及基隆為代表，淡水港為台北盆地出入的要津，於日記中亦見淡水港的描繪。如田健治郎記載 1919 年自大稻埕搭乘小汽艇，視察淡水河及淡水港，並描寫沿途所見：「徐逐流而下，漸下而到與基隆河交會之處，兩山相迫，河幅不過三百餘間，稱之關渡。過之，河幅漸闊大，左聳觀音山，右大屯山腳，入海之處是為淡水港。」（《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1919 年 12 月 17 日，頁 170）此段描繪沿途風景、地形與相對位置，從基隆河交會到關渡，並形容河的寬窄與山名，突顯其特殊的地形景觀及視野。田健治郎以台灣總督巡視的角度，表達帝國北端出入門戶的意象，呈現其職位身分所再現巡視旅行的意義。田健治郎又記錄前往淡水所見：「砲臺中樞圍以石壁，有窿穹門，題曰『北門鎖鑰』。嗟！此天險幸不奪於佛而遂歸於我，語曰在德不在險，是此之謂乎。」（《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1922 年 6 月 4 日，頁 585）田健治郎巧妙化用唐代劉禹錫〈陋室銘〉所言「惟吾德馨」，先敘說歷史的背景，淡水保存清法之戰的礮台遺蹟，以及台灣清治時期巡撫劉銘傳於 1886 年（光緒 12 年）的題字，誇耀如今此地已成為日本的殖民統治範圍。在鐵路興起以前的舟運時代，淡水河及其支流是台北盆地的主要交通路線，與漢人在盆地初期的發展密切相關。沿淡水河出海，成為台北盆地唯一方便的出入口²²。1932 年張麗俊前往淡水，亦於日記中描繪沿途景色：「至郡役所，登樓遠眺，東瞻大屯、西望觀音、南看稻江、北覘雲海，而淡水河口一帶鄉村言是八里分〔埜〕也。」（《水竹居主人日記（九）》，1932 年 8 月 27 日，頁 134）著重於載錄拜訪郡農會、三芝庄小基隆組合等活動。從田健治郎與張麗俊的日記關於淡水港的記載，呈現兩位作者關注的焦點所在，及所提及相關活動的差異性。

1920 年田健治郎前往基隆視察，包括稅關支署、鐵道上屋及倉庫、牛稠港魚市場及漁港浚渫工事、社寮島漁港開築工事，並撰寫遠眺的經驗：「辭而歷巡

²¹ 曾華壁，〈國家政策與區域開發關係之研究：以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為探討的樞軸〉，《東台灣研究》第 7 期（2002 年 12 月），頁 72。

²² 溫振華，〈淡水開港與大稻埕中心的形成〉，《歷史學報》第 6 期（1978 年 5 月），頁 248。

港務所及基隆支廳，遂一拜基隆神社而登其後山。眺望闊大，基隆港之大勢，入於一望之中。」(《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1920年5月31日，頁324)以總督之身分巡視基隆，並登山遠眺基隆港。至於張麗俊則因女婿居住在基隆，故常得機會北上，曾於1926年描寫基隆的特色：「天然古木配邱山，水色嵐光夕照還，四顧層樓今昔異，舟車輻輳港中灣。」²³從大沙灣安瀾橋一帶的旭丘山，可遠眺基隆港及四周市區景觀。當1930年張麗俊再次遊基隆市街，描繪進入慶安宮的情景：「觀慶讚中元各柱首之斗燈，其座之高大華麗目所未睹。」²⁴1932年正值盂蘭盆會，記錄：「今年輪值張、廖、簡，本欲算其豬數，指不勝屈，聞人言有千頭云。吁！基隆人之迷信比別都會更甚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1932年8月27日，頁134)以中元節慶突顯廟宇等人文地景的特色，又親見基隆祭品盛況，而發表個人對風俗的論述。

有關空間的論述提到空間之所以形成的根本性原由，端賴人群的建構。空間一開始已然是社會的空間，即使是所謂的自然空間，當它們被提到時，已經進入人類社會²⁵。如位在南部的壽山，其改名的由來即是人為的建構而成。高雄舊稱「打狗」，1923年日本皇太子裕仁到高雄視察並慶祝壽誕，田健治郎於日記提到：「一行皆誇健腳，忽而達於舊砲臺地點，休息於小亭內。奉命艦隊三隻，則金剛、比叻、霧島皆碇泊於港外，在丘腳直下，風景之雄大奇絕，殆不可名狀。」²⁶壽山位於高雄市的西邊，西臨台灣海峽，東臨市區，北臨左營軍港、南接高雄港²⁷。因以打狗山貴賓館為駐蹕行宮，田健治郎將打狗山改名為壽山，並闢建壽山紀念公園，為高雄第一座公園。1927年壽山成為台灣八景之一，1929年在壽山山腰上建「高雄神社」。林獻堂曾於《灌園先生日記》記錄兩次至壽山的經驗，一為

²³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中：台中縣文化局，2004年)，1926年12月9日，頁129。

²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八)》(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中：台中縣文化局，2004年)，1930年9月17日，頁268。

²⁵ 王志弘，《流動、空間與社會》(台北：田園城市文化，1988年)，頁11。

²⁶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鍾淑敏執編，《臺灣總督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下)》(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年)，1923年4月22日，頁386。

²⁷ 李侑珍、盧道杰、李國忠，〈高雄市壽山自然公園的建制過程與初期規劃經驗〉，《臺大實驗林研究報告》19卷2期(2005年6月)，頁111。

圖 4 為林獻堂攀登新高山路線圖，他數年來有意登新高山，然礙於關節炎躊躇不決，後因日下辰太知事鼓舞而決心登山。1935 年 9 月 21 日與林瑞騰、林資彬、林水來、林成龍、知事使佐藤房吉郡屬、警察課使松永豐吉特務一同前往。一行七人自霧峰出發，經草屯、南投、名間、集集、水里坑、十分間、日月潭涵碧樓。再往東埔，經頂崁、新山、郡坑、茅埔、內茅埔、筆石、和社。又經雲龍瀧、樂樂駐在所，住宿於觀高駐在所。從八通關、三勝橋、老濃橋、安心橋、長命泉，登新高山後下山。經乙女瀧、北山峽，返東埔山莊。最後搭火車經水裡坑、集集，返回霧峰住所。觀此旅行路線，得知他們特地繞經日月潭留宿，再至新高山，途中曾停於樂樂觀高駐在所。林獻堂曾記載登山過程中驚險的情景，下山前，拾取新高山的石子攜帶回家以茲紀念。過北山峽後的斷崖，驟雨忽至，雨點打落小石子，牽連大石滾落：「余恐被石所擊，急坐於路傍。」落石威脅生命的安危，驚險至極，亦呈現水土保持的重要性。他記錄登山途中所見：「過富士標高則概無草木，赤黑嶮峭，望之生畏。十一時半抵主山肩，前望西山、南山俱在足底，回望次高山亦卑卑不足道。白雲如雪，阿里山以下皆被其所覆，真絕大偉觀之雲海也。」³¹「地方」是持續不斷修訂的歷史，是一個重要的意義來源，因此是詮釋文化習俗的基礎，也是當前不可或缺的背景³²。林獻堂於日記中描繪登新高山的經驗，並流露對這座台灣代表性高山的的地方感。所謂「再現」是「通過語言生產意義」、「賦予事物以意義的方法」，是「理解人、物、事的世界的方法」³³。從日記中得知這些旅行敘事的種類包括社群團體旅遊、總督巡視旅遊及友朋相約之旅等類別。旅行文學蘊含歷史、地理、人文、社會、經濟、甚至政策的脈動，作者於日記再現台灣地景的特色，並賦予自然與人文意義。

³¹ 同註 20，1935 年 9 月 24 日，頁 337。

³² Edward S. Casey, "Place," *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Alan Barnard and Jonathan Spencer, e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0), pp. 540.

³³ Stuart Hall, "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ed. London and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1997), pp. 16-32.

三、地景的時代轉換痕跡

空間與人的關係密不可分，人思考自己在各種空間中的遭遇、自己與他人在不同空間中的往來位置、各種空間的定位與意義，以及自身與空間中銘刻的權力網絡關係，都必須透過敘事來表述。空間之於散文和詩的關係明顯且歷史長遠，空間是寫景詠物或遊記詩文的主角。山川湖嶽、名勝古蹟、大城小村、異國情調、在地風土，乃至於廳堂陋室，常常是散文與詩主要描繪的對象。以空間作為主角，不僅早已發展出豐富的詩學傳統，其中甚至有非常實用性的目的。八景詩的盛行，除了文人傳統的流風，與政治宣傳和觀光行銷的淵源也不容迴避³⁴。就旅遊的發展脈絡而言，台灣總督府推出距離短、票價相對便宜的行銷手法，促成更多台灣人利用鐵道旅遊³⁵。日記為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敘事體，多保存作者當時的親身見聞，以及銘刻地景的紀錄。本文擇選與日治時期產業相關的地景，有些因現代的建設及政策，而使地景有所改變。如阿里山、八仙山因伐木場的設立，而成為台灣日治時期重要產業的地景；日月潭則因水力發電廠的設置，而成為台灣重要的水力資源地。這些地景亦展示殖民產業成果，故以日記中的地景為例，探討時代轉換的痕跡。

田健治郎於 1920 年的日記著重鵝鑾鼻的地方產業，不僅記錄許多的鯨種，亦親見當時發展海洋漁業及鵝鑾鼻捕鯨的過程：「於鵝鑾鼻岬行鯨獵，獲二十九頭大鯨，揚陸處理之設備今尚現存。唯為之生多蒼蠅，擾擾營營，不耐厭煩。」（《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1920 年 4 月 27 日，頁 281）日治時期於鵝鑾鼻的鯨獵數量，據王愈超〈墾丁國家公園鄰近海域鯨豚類生物調查研究〉提到：1920 到 1924 年間共捕獲 740 頭大翅鯨、18 頭抹香鯨、10 頭塞鯨和一頭長須鯨。捕鯨行為從 1913 年已開始進行，台灣南端海域的海洋地理環境具多樣特色，因此擁有較高的鯨種歧異度，多樣性的物種與在台灣南端匯集的台灣海峽海流、南海水團、黑潮洋流息息相關³⁶。田健治郎的日記以捕鯨現場作為觀察對象，記錄鵝鑾鼻地理位置的優勢及鄰近周遭的相關產業。鵝鑾鼻是台

³⁴ 范銘如，《空間／文本／政治》（台北：聯經，2015 年），頁 17-28。

³⁵ 曾山毅，《殖民地台灣と近代ツーリズム》（日本：青弓，2003 年），頁 113。

³⁶ 同註 11，頁 3-17。

灣最南端的海角，地理景觀相當奇特，包括巨礁及洞穴等。從日記又見另一景象：「入墾丁養種畜場。場背大尖石山，臨大板埕灣，左鵝鑾鼻，右貓鼻岬，丘山起伏，景勝之偉大所稀見也。」（《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1920年4月27日，頁281）臺灣總督府種畜場位於鵝鑾鼻庄墾丁寮，距離恆春街約二里半的龜仔角的山麓。墾丁養種畜場以繁殖種畜為主，透露田健治郎留意台灣南部產業試驗場。

關於日治時期嘉義的產業面貌，首具規模的官營伐木事業始於1912年阿里山森林開發，據此經驗模式，其後陸續有八仙山與太平山等森林開發計畫³⁷。日記保存阿里山的地景及伐木事業的情況，如1920年5月田健治郎前往阿里山巡視，關於神木的資料如：「幹周六十四尺，樹齡三千年云。此地標高七千尺餘，崇而為神木，結柵而保護之。」（《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1920年5月16日，頁306）一行人曾於神木下合影留念，更記錄視察阿里山伐木業的實況：

其大者直徑七尺，高百四十尺，材積約二百二拾三石，蓋千年以上之物。其小者，亦不降三、四百年之物。各五人若三人工匠斧之、鋸之，順序號然而倒，其震動之勢，山鳴地響，附近低樹無不破斫，真壯絕淒絕之觀也。（《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1920年5月17日，頁307-308）

不僅詳細記錄形狀、體積、樹齡等數據，更親身視察森林集體伐木的實況，以及因伐木而造成山林震動、轟然巨響的聲勢。

一〇年代是近代台灣林業史相當重要的年代，台灣總督府諸多林業基礎事業。如明治末期至大正初年完成的林野事業、1910年建立的台灣總督府阿里山作業所、1911年的台灣總督府林業試驗所、以及1919年制定之台灣森林令皆是。阿里山作業所與林業法令的制定與實施，大幅改變阿里山的地貌，並影響

³⁷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領臺二十年臺灣林業ノ沿革並成績概要》（台北：台南新報社台北支局，1916年），頁49；李依陵、黃建中、何幸霖，〈林務局所藏日治與戰後林業檔案簡介〉，《臺灣史研究》17卷2期（2010年6月），頁215-216。

台灣近代林業發展³⁸。張麗俊曾於日記提到至阿里山參訪，及觀看「砍大樹」的經驗³⁹。《灌園先生日記》則詳細記載：

近阿里山，尚留有多少之古檜，有最大一株名曰神木，週圍六十尺，高十餘丈。看完神木濃霧忽至，將到阿里山驛而雨忽至，余等同十餘軍人、十餘臺人直到眠月看集材所，其拖木材之機曰スキラ，有八十馬力，由二千四百尺之距離拖木材而上。又看工人登木伐樹，每日有二百工人採伐，因霧濃密罩一無所見。⁴⁰

載錄神木的具體數據、砍伐原木所需人力，以及交通運輸等相關資訊。除了這些伐木所需的大型機械外，為了將砍伐的木材運下山，日本人投資興築八仙山、阿里山與太平山等森林鐵路⁴¹。另一中部林場為八仙山，張麗俊〈八仙山即景〉如此描繪：「臺中名勝八仙山，萬仞黎明在此間，百丈鉛橋高百米，千町鐵路曲千灣。危崖色頂神工出，箐密林深古木刪，政府經營真周到，運輸全部是機關。」⁴²透露張麗俊讚賞殖民政府的交通運輸建設及鐵路、伐木等事業管理經營的視角。八仙山蘊藏針葉樹類台灣扁柏、紅檜、香杉、紅豆杉一級木極為珍貴的樹種，及二級木中的鐵杉、雲杉、松類等。八仙山林場因林木蘊藏豐富，於是在 1914 年進行開發，1917 年在山腹鋪築鐵路一段作為運材。1924 年始完工，並連接豐原、土牛間之 14 公里輕便鐵道，及拆除土牛至九良栖間之木馬道，改敷約 50 公里長之鐵軌，採台車運材⁴³。這些日治時期的現代化措施，致使原始森林逐漸轉變成具殖民經濟目的之林場。

南投日月潭位於埔里盆地，是台灣最大封閉型的湖泊盆地，日月潭的景色早在清治時期即為許多文人所歌詠。日治時期因其形狀貌如日月而得名。1931

³⁸ 吳明勇，〈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阿里山作業所建立之歷史考察（1910~1915）——以官制、分課規程與人事結構為中心〉，《人文研究期刊》第 9 期（2011 年 12 月），頁 83-84。

³⁹ 同註 24，1930 年 11 月 25 日，頁 298。

⁴⁰ 同註 14。

⁴¹ 李久先、許秉翔，〈戰後台灣森林經營與遊憩之發展史〉，《林業研究季刊》32 卷 1 期（2010 年 3 月），頁 88。

⁴² 同註 15，1936 年 8 月 15 日，頁 247。

⁴³ 簡義倫，〈日式伐木系統與美式伐木系統之比較——以八仙山林場及大雪山林業公司為例〉，《人文暨社會科學期刊》6 卷 2 期（2010 年 12 月），頁 35-45。

年台灣電力株式會社開始興建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迄 1934 年完工後，周邊的環境已與以往迥然不同。早在興建之前，田健治郎曾於 1921 年前往日月潭視察，大越技師先向他說明工程相關內容：

右岸懸崖直立千百尺餘，導日月潭水至崖頭，水量九百立方尺，直下入鐵管，設發電所於其腳，以發十四萬馬力之電力，真是理想的發電所也。只潭水不過給三百立方尺，故穿約六里隧道於高峻山岳，自濁水溪本流導入六百立方尺之水，貯溜之於日月潭，獲預定之水量云。（《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1921 年 5 月 21 日，頁 185）

田健治郎乘轎與大越技師前往視察「索道停留場」與「溢水吐出閘」，並於日記中載錄此工程所造成的改變：「築堤功成後，水面高加七十五尺，樓下廿五尺以下之地皆沒於水底。現在丘山，有或為小島或為半島者，湖域殆成倍加，增加水量約五十七億立方尺云。」如此堰堤等工程的興建，雖增水量，但造成水位加高，淹沒小島等影響。後來田健治郎乘機關艇進入日月潭中原住民部落，與居民交流並觀察其生活方式：「此等蕃人頗服皇化，專服農業，故稱之化蕃。有一詩：輕舸浮湖入翠鄉，化番雲集近相迎；女兒歌唱男環舞，撞杵鏘鏗更有情。日月潭邊別有天，碧山涵水氣渾然；臺灣第一幽玄境，掃盡紅塵人欲仙。」（《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1921 年 5 月 22 日，頁 187）田健治郎記錄工程的規畫，他因離開家園感受殖民地風土民情及文化差異，欣賞原住民的杵歌表演，形容此地彷如幽玄仙境。然而，如此描繪原住民順服的表象，卻忽略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制約。

日治時期日月潭建壩成為水力發電所，是當地現代化最顯著的設備之一。日月潭因建設開發，自然景觀有所變化，原住民的生活方式亦有所變遷⁴⁴。1934 年張麗俊於日記中提及一行人參觀日月潭發電所：

蓋此發電之水引濁水溪之水入姊妹原淨水池，穿五大山嶽隧道，水出日月潭為積水池，又對潭底穿八、九里隧道出門牌山頂，埋五大鐵管，水

⁴⁴ 邱雯玲，〈湖濱觀光遊憩地理研究：以日月潭為例〉，《戶外遊憩研究》4 卷 1 期（1991 年 3 月），頁 43。

由千尺瀉下，沖動機關飛轉，故發電之強可為全島之用，亦因水力之大所致也。（《水竹居主人日記（九）》，1934年11月14日，頁510）

他並轉錄日月潭電力之歷史，詳細條列相關事項，如：「日月潭電力工事始於大正八年八月，依官民合同創立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不僅詳列工事所耗費用，又提到世界大戰後資金調達之困難，工事頓挫、外債借入的情況。最後以「日月潭之電力乃帶有特殊使命，是故當與殖產當局提攜，以圖本島農村之工業化，藉以啟發大眾之利益，方不失臺灣電力之一大使命」。又認為民間亦須覺醒，不可沈迷於睡夢之中：「講究種種方法振興中小工業，如此臺灣之農村才具發展餘地；如果守舊而抱膝徒老，守株待兔，不謀求進取之道，一旦大難臨頭，則噬臍莫及矣。」（《水竹居主人日記（九）》，1934年12月6日，頁521-522）提到供電需求的迫切性，呈現張麗俊強調今後如何加強農村工業化的必要。電力與台灣工業化有所關聯，日月潭電廠雖在1934年才加入營運，但高達10萬kw的裝置容量，短短五年發電量就已佔過去二十年累計發電量的43%（18.1億度），加第二電廠的7%（2.9億度），兩座電廠發電累積量已佔全部的50%⁴⁵。當時日月潭電廠為台灣提供大量的電力，為總督府現代化建設的成果之一；但同時造成對於日月潭地貌的改變，更影響原住民的日常生活型態。如《灌園先生日記》提到林獻堂與林瑞騰、林資彬、林水來、林成龍、警察課使松永豐吉特務，於1935年自霧峰出發欲往新高山，途中曾至日月潭，日記中詳載轉變：

抵日月潭涵碧樓，二時乘電力會社汽動船遊潭，潭水比舊時漲五尺，珠山頂上僅有尺餘，若水量增至六尺，則全沒矣。山上有一神社，久保天隨所作之漢文碑記。聽蕃人唱歌，俱面有菜色，因當局禁止其無斷開墾也。⁴⁶

林獻堂觀察到原住民雖表演歌唱節目，但卻呈現營養不良、臉色青黃，此因殖民者的禁制致使原住民無法繼續本來的農耕型態，生產活動亦被迫改變。林獻堂於霧社事件後，曾撰〈討蕃〉一詩中發抒感慨：「螻蟻生機迫，鯨鯢血壘新；

⁴⁵ 吳政憲，〈「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發電量之研究（1920-1939）〉，《興大人文學報》第39期（2007年9月），頁337。

⁴⁶ 同註20，1935年9月21日，頁330。

蛛絲三面網，保種望深仁！」⁴⁷此詩以螻蟻比喻原住民生活受迫為意象，希冀殖民者仍存有仁心，勿再繼續迫害原住民。

至於八景的北部地景，則以淡水及基隆為代表。如與對外交通門戶有關的淡水港，田健治郎曾於日記中描述此港相關歷史：

昔時為臺灣北部之要港，與福建廈門之航通概據此港。三十餘年前佛支交戰之起也，佛將苦流米砲擊本港，清將沈石船數隻閉塞河道，加之近年流砂沈堆，水深漸淺，遂到不可容大船，真可惜也。土木技師開地圖，說明築港計畫，然巨費上數千萬圓，未易俄斷行，尚要十分之研究。
（《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1919年12月17日，頁107）

田健治郎回溯1884年清法戰爭的影響，十月因清軍以巨石沉船，築成堤壩，封港堵住淡水河口。因戰事的人為因素，再加上自然環境的淤積，導致他當時所見淡水港已無法容納大型船艦⁴⁸。田健治郎於台灣的巡視之旅，使他得以田野蒐羅或分類，而修正對台灣的想像，呈現對殖民地文化凝視的觀點。田健治郎於巡察另一個北部八景基隆時，呈現何種觀看的視角？他於1919年11月的日記中提到初以台灣總督的身分親臨基隆港，故於鄰近港灣的海面上，或港邊及沿路皆見迎接者，甚至以燈塔的信號表達對總督的敬意。更特別的是他得以聆聽基隆築港工程的沿革，以及未來的工程計畫（《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1919年11月11日，頁60）。在日治初期基隆港已轉變為現代化的國際商港，台日間的航線是以基隆為主要的進出港。築港與市區改正計畫的影響下，基隆從漁村轉變為現代化的港口與城市。在田健治郎的日記中，保留詳細的修建預算及經費、工程設計所考量的地形等資料，並記錄登山遠眺鳥瞰基隆市區的經驗。

台灣神社位在劍潭山半腰，為「台灣八景」票選活動結果中，以「別格」之姿列為「神域」。1908年張麗俊與袁錦昌、謝秋濤、王劉銅鐘等人相約至員山、大龍峒等地，並順道前往台灣神社：「謁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遺跡，少頃下山，

⁴⁷ 林獻堂，〈討蕃〉，《櫟社第一集·灌園詩草》，收於傅錫祺編，《櫟社沿革志略》（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臺灣文獻叢刊】170種，頁153。

⁴⁸ 1884年十月一日法艦皆不得入，而停泊於沙崙外海。許文堂，〈清法戰爭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學、史實與集體記憶〉，《臺灣史研究》13卷1期（2006年6月），頁8-9。

並往士林閒遊。」⁴⁹張麗俊提到：「是日北白川宮新社祭，十時仝警官、區長、保正到公花園行遙拜式。」⁵⁰北白川宮新社祭即北白川宮神社祭，或稱台灣神社例祭日，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的 10 月 28 日雖多提及台灣神社祭，但皆僅簡要紀錄⁵¹。回溯台灣神社的歷史，1895 年 5 月 30 日身任近衛師團團長北白川宮從基隆澳底登陸，同年 10 月 28 日於台南駐在所罹病去逝。後建造台灣神社奉祀北白川宮，成為日本南方鎮守大社。身為明治天皇的皇叔，死於台灣的北白川宮成為日本統治台灣的精神象徵——台灣神社的鎮守神祇⁵²。至於田健治郎於 1919 年 10 月 29 日接任台灣總督，於同年 11 月 11 日抵達基隆並進入總督官邸，當天即曾前往台灣神社祭拜：「入總督官邸，宏壯華麗如宮殿。少憩後，受各種內外縉士之禮訪，儀了而再依第一公式行列參拜台灣神社，祭少名彥名外二神及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之官幣大社也。」（《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1919 年 11 月 11 日，頁 60）此神社成為殖民最高行政長官就任行禮如儀之地，神聖空間的意義更加彰顯。日本統治之後所選定的別格，強化「台灣神社」地景的殖民滲透，以及祭典儀式所隱含的教化目的。

四、結語

目前所見一些日記的內容，不僅具記錄代表性的歷史事件、留存時代記憶等史料價值；同時蘊含書寫豐盈的台灣地景，以及個人旅行感受等文學面向。日記獨特性來自於它與特定時間及空間的連結，日記是記主透過「每日的」書寫行為，將文字定著在特定的時空之中的個人紀錄；換言之，日記除了體現記主「個體視角」的特性之外，日記在本質上具有鮮明的「時空性或脈絡性。在這個意義上，故以透過日記本身的「空間」面向所衍生的特殊視角，討論記主

⁴⁹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中：台中縣文化局，2000），1908 年 11 月 1 日，頁 114。

⁵⁰ 同註 49，1908 年 10 月 28 日，頁 109。

⁵¹ 呂紹理，〈老眼驚看新世界：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張麗俊的生活節奏與休閒娛樂〉，收於陳志聲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台中縣文化局，2005 年），頁 369-400。

⁵² 吳佩珍，〈明治「敗者」史觀與殖民地台灣——以北白川宮征台論述為中心〉，《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0 期（2015 年 4 月），頁 136。

個體對不同景點的旅行敘事，以及地景本身在時間過程中顯現的變遷軌跡為研究取徑。方法論上則從跨領域、跨學科的整合研究取徑，考察書寫者對於地景的觀感與敘事。本文以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田健治郎《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作為研究文本，以 1927 年台灣八景以及別格為例。此三位作者皆具漢文寫作的素養，其日記文字多具文學底蘊。張麗俊與地方組合成員及友朋曾至台灣各地參訪，因而於其日記中常見旅遊的記載。任職於 1919-1923 年第一位台灣文官總督田健治郎常前往台灣各地視察，更於日記詳細記載相關細節。林獻堂為台灣文化史上代表性人物，交遊廣闊，曾至鵝鑾鼻、阿里山、日月潭等地，並於 1935 年登上新高山。這三位作者多以詩文相映的方式表達親身見聞，不僅以文描繪旅遊參訪的經驗，更以詩刻劃山水意象及個人感受。日記常回溯地景的歷史背景，又保存當時旅遊路線、交通方式及相關活動的資料，具記錄地景的實用功能。

先從閱讀日記中的風景意象，分析旅行敘事再現八景的表現手法。他們三人皆曾到中部著名八景阿里山旅遊，並記錄觀看神木、雲海、群山等景象。又皆曾到另一中部八景日月潭，以遊記描繪日月潭之旅的經驗，或是原住民的表達文化及神社等日治時期的文化地景。東部八景之一的太魯閣，因交通不便的因素，日記中較少見到有關的記載。僅從林獻堂於日記中載錄曾嘗試前往，卻因下雨且臨海道路通車時間的限制，而得知當時旅途的難度。北部的八景如淡水港，田健治郎描繪淡水為台北盆地的出入口地景，突顯帝國北端出入門戶的意象；張麗俊則記錄訪農會、三芝庄小基隆組合等。港口具現代對外交通的出入境樞紐，但因兩人身分的差異而聚焦的觀點亦不同。林獻堂登新高山的珍貴經驗，流露對於台灣這座代表性高山的地方感。

日記為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敘事體，多保存作者當時的親身見聞，以及觀景察變的紀錄。故擇選日記所載與日治時期產業相關的地景，分析地景因現代化的建設及政策而有所改變。這些地景亦展示殖民產業成果，如田健治郎留意南部鵝鑾鼻的捕鯨及墾丁種畜場等產業。中部八景的阿里山、八仙山，則由於森林令的制定與施行，紛設伐木場導致地景的變化。田健治郎於 1920 年至阿里山巡視，張麗俊及林獻堂亦曾於 1930 年及 1931 年前往阿里山，並於日記中記錄

沿途地名、林相變化、神木、雲海等景色，與當地樟腦蔡及伐木作業情形。日記中載述伐木所需要的大型機械，以及集體伐木或山林震動及轟然巨響的聲勢。為了將砍伐的木材運下山，日本人投資興築八仙山、阿里山與太平山森林鐵路，日治時期的現代化措施，逐漸轉變成具殖民經濟的意味。

由於三位日記作者身分與社會地位不一，得見其觀看視角的差異性。田健治郎強調「客」的身分，並流露以巡行視角考察殖民建設，台灣在近代化過程中官方與民間的敘事迥然不同。從台灣總督的觀點，日記旅行敘事中的地景，多呈現為了永久化占有而提出官方治理的視角。林獻堂則代表台灣本地的人文雅士，對於台灣在現代化過程中風景的轉變有感而發。又如日月潭因水力發電廠的設置，而使此地成為台灣重要的水力資源地。早在興建水力發電廠之前，田健治郎曾於 1921 年前往日月潭視察，著重記錄工程的規劃，又形容此地仿如幽玄仙境，忽略原住民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壓制。張麗俊則於 1934 年肯定殖民政府的建設與經營，以供電需求的迫切性，強調今後如何圖農村工業化的必要。至於水力發電廠完工營運後，林獻堂於 1935 年細膩觀察到對於原住民的衝擊。並描繪其見營養不良、青黃的面容。此因殖民者的禁約，致使原住民無法繼續本來的農耕型態，生產活動被迫改變。田健治郎來台當天即至台灣神社祭拜，張麗俊的日記則簡要提及 10 月 28 日台灣神社祭。日治之後所選定的別格，強化「臺灣神社」地景的殖民滲透意義，以及祭典儀式所隱含的教化目的。這些日記中的鵝鑾鼻、阿里山、八仙山、日月潭及台灣神社等敘事，多呈顯地景所蘊含的時代轉換痕跡。透過分析日記作者觀看地景的視角等相關議題，藉以發掘文本與文化的關聯，詮釋日記的空間心境或地方感的學術意義。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專書：

田健治郎著，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邱純惠主編，鍾淑敏執編
《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2001年）。

———，《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中）》（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06年）。

———，《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下）》（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09年）。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領臺二十年臺灣林業ノ沿革並成績概要》（台北：台南新
報社台北支局，1916年）。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編，《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台北：中
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四）：一九三一年》（台北：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編，《灌園先生日記（六）：一九三三年》（台北：中
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

林獻堂著，許雪姬編，《灌園先生日記（八）：一九三五年》（台北：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二）》（台北：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中：台中縣文化局，2000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七）》（台
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中：台中縣文化局，2004年）。

———，《水竹居主人日記（八）》（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中：台中縣文化局，2004年）。

———，《水竹居主人日記（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中：台中縣文化局，2004年）。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編纂・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九）》（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中：台中縣文化局，2004年）。

報紙文章：

台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6月5日，第2版。

台灣日日新報社，《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8月1日，第4版。

台灣日日新報社，〈新高山の名を賜ふ〉，《臺灣日日新報》，1987年7月14日，第2版。

二、近人論著

專書：

王志弘，《流動、空間與社會》（台北：田園城市文化，1988年）。

陳志聲主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台中縣文化局，2005年）。

吳鈺瑾，《島民、新民與國民：日治臺籍教師劉克明（1884~1967）的同化之道》（台北：秀威資訊，2015年）。

林惠琇，《「六三問題」與日治時期台灣知識菁英自治主張之研究》（台北：稻鄉，2009年）。

范銘如，《空間文本政治》（台北：聯經，2015年）。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

曾山毅，《植民地台湾と近代ツーリズム》（日本：青弓，2003年）。

- 傅錫祺編，《櫟社沿革志略》（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
- 廖炳惠，《臺灣與世界文學的匯流》，（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
-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 Casey, Edward S., Alan Barnard and Jonathan Spencer, eds., *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0).
- Hall, Stuart,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and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1997).

期刊論文：

- 王愈超，〈墾丁國家公園鄰近海域鯨豚類生物調查研究〉，《保育研究報告》第107號（2000年12月），頁1-50。
- 衣若芬，〈「江山如畫」與「畫裏江山」：宋元題「瀟湘」山水畫詩之比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3期（2003年9月），頁33-37。
- 李侑珍、盧道杰、李國忠，〈高雄市壽山自然公園的建制過程與初期規劃經驗〉，《臺大實驗林研究報告》19卷2期（2005年6月），頁103-131。
- 李依陵、黃建中、何幸霖，〈林務局所藏日治與戰後林業檔案簡介〉，《臺灣史研究》17卷2期（2010年6月），頁213-241。
- 李久先、許秉翔，〈戰後台灣森林經營與遊憩之發展史〉，《林業研究季刊》32卷1期（2010年3月），頁87-96。
- 邱克威，〈林連玉〈吉隆八景詩〉釋義：兼論林連玉的詩藝風格〉，《台灣東南亞學刊》11卷2期（2016年10月），頁141-160。
- 邱雯玲，〈湖濱觀光遊憩地理研究：以日月潭為例〉，《戶外遊憩研究》4卷1期（1991年3月），頁35-65。
- 吳政憲，〈「臺灣電力株式會社」發電量之研究（1920-1939）〉，《興大人文學報》第39期（2007年9月），頁329-366。

- 吳明勇，〈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阿里山作業所建立之歷史考察（1910～1915）——以官制、分課規程與人事結構為中心〉，《人文研究期刊》第9期（2011年12月），頁81-133。
- 吳佩珍，〈明治「敗者」史觀與殖民地台灣——以北白川宮征台論述為中心〉，《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20期（2015年4月），頁131-157。
- 林開世，〈風景的形成和文明的建立：十九世紀宜蘭的個案〉，《臺灣人類學刊》1卷2期（2003年12月），頁1-15。
- 許文堂，〈清法戰爭中淡水、基隆之役的文學、史實與集體記憶〉，《臺灣史研究》13卷1期（2006年6月），頁1-50。
- 許雪姬，〈台灣日記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台灣史研究》22卷1期（2015年3月），頁153-184。
- 陳計堯，〈「邵族」與「鄒族」：日治時期對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知識建構〉，《政大民族學報》第24期（2005年11月），頁205-241。
- 曾華璧，〈國家政策與區域開發關係之研究：以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為探討的樞軸〉，《東台灣研究》第7期（2002年12月），頁67-102。
- 溫振華，〈淡水開港與大稻埕中心的形成〉，《歷史學報》第6期（1978年5月），頁245-270。
- 廖振富，〈《傅錫祺日記》的發現及其研究價值：以文學與文化議題為討論範圍〉，《臺灣史研究》18卷4期（2011年12月），頁201-239。
- 蕭瓊瑞，〈認同與懷鄉：臺灣方志圖中的文人意識（以大八景為例）〉，《臺灣美術》第65期（2006年7月），頁4-15。
- 簡義倫，〈日式伐木系統與美式伐木系統之比較——以八仙山林場及大雪山林業公司為例〉，《人文暨社會科學期刊》6卷2期（2010年12月），頁35-45。

碩博士論文：

- 吳兆宗，《昭和2年臺灣八景募集活動及其影響》（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